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五辑）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 问题与前瞻

Review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al History Studies :
Problems and Prospective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编

014032388

D691.2

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 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五辑）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 问题与前瞻

Review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al History Studies :
Problems and Prospective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 编

D691.2

1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航

C17206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ISBN 978-7-5097-5534-1

I. ①晚… II. ①中…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030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 (第五辑)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吴 超

责任校对 / 李 俊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34-1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23.25

字 数 / 390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张海鹏 / 1
近五年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	崔志海 / 28
晚清政治变革视角下经世致用史学的研究	刘俐娜 / 69
晚清秘密社会史研究	韩志远 / 102
海内外满汉关系史研究概述	刘小萌 / 126
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任智勇 / 167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姜 涛 / 191
捻军史研究回顾和展望	顾建娣 / 222
同光新政与派系纷争研究述评	邱志红 / 24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	马忠文 / 272
清末袁世凯集团研究述论	马平安 / 297
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细珠 / 327
附录 “晚清史论丛” 目录	/ 355
后 记	/ 365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张海鹏*

一 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与联系

晚清史研究，是清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今天，这是毫无疑义的。在1999年姜涛发表《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①点破这一点以前，学术界的认识是不明确的。那以前，人们谈到清史，实际上并不包括道光二十年以后的历史。人们说到中国近代史，往往是指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似乎晚清的历史不在清史研究的范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启动之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个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开出一个清史著作书目，竟都是嘉庆以前的，我问道光以后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无以应对。还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编纂工程中担任重要任务的学者，说自己并不适合在清史工程中担任职务，理由是自己的专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之间是存在壁垒的，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划有界限的。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说，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是有某种区分的。这种区分，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当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首先出现以近代史冠名的研究所，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各大大学普遍讲授以后。在大学里，嘉庆以前的历史放在中国古代史里讲授，道光以后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讲授。晚清史与中

*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① 姜涛：《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国近代史的区分，就在学者中自然形成了。没有人专门论述过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问题，也没有任何行政部门就此发表过意见。这是一个学科成长的自然历程。

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学者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最近20年来，大多数学者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不管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如何演变，鸦片战争至清帝被推翻这一段晚清史，都包括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范围内。因此，从学科演变的历史来说，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换一句话说，晚清史包括在中国近代史内。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看晚清史，1840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从社会底层到庙堂之上，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随着外国侵略加深，不仅对外战争不断，国内战争也不断。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再到中国同盟会倡导、推动的革命，直至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出现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西方的机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移植到中国，中国国内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上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新的知识群体，譬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譬如与传统士人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戊戌维新开始，国内逐渐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为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奔走呼号。这些社会新势力，都是区别于传统势力的。这也是中国社会从“沉沦”到“上升”转变的重要标志。

如果从清史的角度看晚清史，情形或许稍有不同。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社会底层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高官显贵声色犬马如故，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朝廷，如何保住乌纱帽，对民间改革朝政的呼声往往视而不见，对农民起义或者革命行动一律采取镇压政策。从清政府一面看，中国社会是在“沉沦”中。庙堂之上不做认真反思，不谋对策，不思进取，没有危机意识，多次失去发展机遇。

所谓发展机遇，含义有三：一是要发展，二是要有国际比较，三是机会来了要抓住不放。所谓“抓住”，是指决策者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观察晚清社会，并不缺少发展机遇。只是由于当时的决策者不能很好认识迅速发

展自己，以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必要性，以致机遇来临时不能很好抓住，终于造成晚清一系列因落后而挨打的悲惨境遇。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鸦片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打击，统治者并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朝廷对世界事务仍是懵懂无知，甚至《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道光皇帝对英国在何方向、道里远近仍全然不晓。林则徐、魏源们虽然得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认识，也撰写了《海国图志》那样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在日本引起轰动，在中国国内却反应寥寥。直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所向无敌，其势力活动于大半个中国，其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咸丰皇帝不得不“北狩”热河，清政府才切身感受到了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但最高统治层仍认为这些只是“肢体之患”，真正构成“肘腋之患”的还是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被彻底镇压以后，国内曾经出现了二十多年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统治阶层某些上层人物对中外发展的差距已有较多认识，政权相对也比较稳定，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为。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明治维新，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统治层中一部分人如军机大臣奕訢、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等发起洋务新政，造船造炮，发展军事工业，随后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形式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这些人试图只在器物层面上作一些变动，而不变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来谋求民富国强。即使这样局部变动也没有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的共识，顽固派、反对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只是居中驾驭，并无定见。这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正好相反。一次发展自己的机会就这样没能抓住，失去了。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新政主持者们求富求强的梦破灭了。

晚清发展的第二次机会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到来的。甲午战后的民族危亡给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刺激和启迪。他们讲学办报，集会结社，一方面聚集力量，另一方面也给群众以新知识的宣传和灌输。他们希望通过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方式，变革朝政，变革思想，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是这些人的代表。恰好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巩固自己亲政的地位，摆脱慈禧太后和老旧重臣的控制，于是与康梁一拍即合，发动戊戌变法。但是变法不过百日，慈禧一伙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处死戊戌六君子，断送了变法的前程，使中国再次失去了发展的

机遇。皇帝尚且不能掌握朝廷实权，那些流亡海外的士子们以保皇相号召，也只是徒呼奈何了。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廷借光绪皇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特别指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甫）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①这是说，慈禧太后是不反对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的，在剪除了康、梁等“乱逆”以后，她是同意变法维新的。这是慈禧太后在新的形势下的自我辩护。这表明，她不是不愿意变法，而是不许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持变法，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行变法，要把变法事业抓到自己手里来做。其实质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实行变法。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发展的机会。在由谁来掌握这次机会上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在朝的统治者和在野的革命派、立宪派都想掌握这次机会，而且在朝、在野各自分别演出了程度不等的悲喜剧。八国联军侵华给清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完全按旧的方式很难维持统治，决心实行新政。从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方面确实有了相当大的动作。朝中大臣反对实行新政的声音很小，反对新政改革的派别几乎不存在。这是与前两次新政根本不同之点。清政府不仅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这是承认政治不如人的表示），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法令、规章条例。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谘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渠道，在官制方面也作了一些革新；在经济措施上鼓励资本家投资工商企业，鼓励资本家发展，商会的普遍发展在客观上鼓励了资本家组织起来；在教育上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制，举办大中小学，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制改革方面也冲击了传统的政法不分、立法司法不清的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此前的两次新政不可比的。如果把这次新政提前四十年，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不同，发生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并非不可能。但这次新政改革是在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总4601页。

中国已经诞生了新的阶级力量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式知识分子群已较多认识到中外发展的差距而力求有更大的改革动作，最高统治者捍卫皇权神圣意志坚决，对体现皇权的有力统治机构军机处不许触动，对应允预备立宪的时间拖得太长。满族亲贵加紧控制政权，尤其加紧控制新练的军队，不仅得罪了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立宪派，而且加深了满汉矛盾；清政府完全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改革以巩固皇权、防止革命为目的，使得这次改革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败，清政府最后一次失去了借改革以谋求发展的机遇。这一次失去发展机遇，对清朝统治是致命的。它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终于被迫走向灭亡。

从清史的角度看晚清史，晚清历史是一部“沉沦”史，是一部走向灭亡的历史。

综合起来看，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方面，除了上面所讲外，还有一点，晚清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不是它的全部。联系方面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基本的，那就是从清史看晚清史，或者从中国近代史看晚清史，所看的部分是同一个，晚清历史是基本的研究对象。从这一点来说，前面所说的研究角度的不同，也不能说得太过绝对。

二 “新清史”与晚清史研究

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提出了“新清史”概念，据说被称为一个学派，而且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深刻辩论。所谓“新清史”学派，在中国学术界近年也引起关注，出现一些评论。笔者发现，中国学者对所谓“新清史”多持怀疑甚至不大赞成的态度。

笔者对“新清史”学派的论著缺乏深入研究，只看过一些评论和介绍。“新清史”派的研究主张重视作为中国统治民族满族的主体性研究，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书写，主张重视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注意研究清朝统治者的“满族性”，这是对清史研究有积极意义的学术见解。但是，对“新清史”的学术成就不能有过高的评价，毋宁说“新清史”的基本学术倾向是值得质疑的。什么“不同凡响”，什么“挑战”，云云，是不切实际的评论。“新清史”的主体观点是所谓满洲帝国与中国不能画等号，中国只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等等，是找不到史料支持的空中楼阁，是研究者的主观想象，是西方世界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折

射，不值得称赞。华裔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评论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学者刘小萌、黄兴涛等先后做出了学术评论。^① 刘凤云、刘文鹏编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搜集了美国学者有关“新清史”的辩论和中国学者的反应，^②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2010年8月^③专门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新清史”的讨论作为会议的主题。会议论文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发表了众多学者的见解。^④

有的学者开始采用“新清史”的观点研究清史。有一篇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以下简称《满文寄信档》）的文章，分析、介绍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满文寄信档》的主旨是运用“新清史”的观点和方法来介绍这本书，研究是否达到预期，是令人怀疑的。据作者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清代军机处专门抄载寄信上谕的重要档簿，无汉文副本，珍贵性毋庸置疑”。作者认为，“‘新清史’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深入研究清史特别是深入研究满文档案之后予以验证和回答”。^⑤ 这篇文章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上谕反映了西北边疆和东北等地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特别是边疆民族事务，以及边疆地区与外国关系事务，在没有汉文副本的情况下，它对于研究清史的史料意义特别重大。该文作者引用“新清史”研究者的观点指出：“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满文档案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这的确是所谓“新清史”派的观点，这句话等于白说。很明白，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研究清史需要重视满文档案，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中国清史学界怀疑过这一点吗？从来没有过。注意发掘满文老档和整理、编辑、翻译满文档案一直是清史研究者努力追求的。^⑥

① 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③ 这次会议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网站报道是2010年8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刘凤云序言记录为2010年8月，董建中、刘文鹏写的后记却记录为2009年8月。

④ 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⑤ 常建华：《从“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的史料价值》，《历史档案》2011年第1期。

⑥ 参见王钟翰《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清史余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吴元丰：《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

《满文寄信档》引用“新清史”观点指出：“‘新清史’认为满洲人从未失去他们在清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想法，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一方面运用中国政治传统，一方面又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在研究清史的学者看来，这句话没有任何新意。满族始终是有清一代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满汉矛盾，一直到1909年三岁的宣统继位，他的父亲载沣任摄政王，还在排斥汉大臣，1911年5月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上是排斥汉大臣的“皇族内阁”或者“亲贵内阁”。这正是满族亲贵维持其满族独特统治之认同的强烈表现。当然，正是这一表现，加速了满族王朝的崩溃。

《满文寄信档》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新清史’研究价值”一节中，指出了几个事实：一是寄信档没有使用中国、中华字样，而是使用了“大清国”字样。作者认为，“自称‘大清国’并不能说不代表中国，这就类似于自称‘大明’而不说‘中国’”。应该说“大清”与“大唐”“大元”“大宋”“大明”一样，正是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改朝换代后的命名传统。另一是“满文寄信档的对外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是‘天朝’一词”。作者指出，“由于‘天朝’一词为汉族语汇，传统上代表中国，因此‘天朝’延续了‘中国’的用法和含义。我们难以判断‘天朝’是‘大清’而非指‘中国’。”以上两点正是说明满族统治者的“中国认同”，在这个大关节上，我们看不出任何与此不同的独特的满族特点。据黄兴涛研究，《清圣祖实录》卷143所载碑文，康熙时期“大清国”与“中国”已经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入关之后的“满洲”不过是满人的族群认同符号而已，它与其自称“中国”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①

《满文寄信档》在指出满语为清朝国语，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同时，作者指出“满人的汉化也是明显的事实”。这一节的研究结论，处处反驳了“新清史”的观点。这告诉我们，“新清史”的观点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新清史”是美国一些研究清史的年轻学者提出的主张，在美国也引起争辩。在我看来，“新清史”没有那么新。说“它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① 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对如今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挑战”，^①未必是准确的。“新清史”的研究者只强调清初的历史，未能关照到晚清的历史。综观有清一代的历史，“新清史”的缺陷是明显的。“新清史”十分关注清初对边疆地区开发的研究，将清史研究从中原转移到边疆，有一定的道理；但清末的边疆正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新清史”在这里如何解释呢？如果将“新清史”称为一个学派，它应该对全部清史有一个贯通始终的解释体系。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体系。研究清史，从客观的学术立场来说，不必过分强调大汉族主义，也不必过分强调大满族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必否认满族的汉化，满族的汉化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所谓汉化，主要指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族文化的全盘吸收和提倡，满语和满文从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强调满族统治阶级的“满洲性”已经泯灭，满族作为有清一代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对汉族的提防和限制是一直存在的。“皇族内阁”的成立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主张大满族主义，不必对满族的汉化刻意回避。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各少数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各民族的冲突、碰撞与融合，长达几千年。这样一个过程中，汉族当然从各民族中学习、吸纳了不少文化因素，但总体而言，是高度发展的汉族文化成为其他各民族学习吸纳的主要对象。这正如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明显高于前资本主义，在炮舰政策的推广下，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影响了世界各民族。即使自称高度发展的汉族经济文化，也受其影响，满族文化自不待言。

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新清史”学派的代表性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发言说：“新清史”很难说是一个学派，只是一种视野或思潮。他个人的研究只是强调满族人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汉化，而主要是因为保持着强烈的满洲特色。对于十多年前何炳棣与罗友枝之间的那场论战，他非常倾向于何炳棣的观点。他认为，清史确实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清朝和中国是不可分的。^②这一段即兴发言，几乎颠覆了“新清史”学派的基本主张，使研究回到了正确的清史研究轨道上来。

① 见贾建飞《“新清史”刍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16日。

② 欧立德的发言，转引自董建中、刘文鹏所写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后记，见刘风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870～871页。

趋新厌旧，可能是人们追求知识的秉性。但是，对于新，要做出分析与判断。有的“新”，是新瓶装旧酒；有的“新”里埋下了毒药；有的新，是真正的创新。晚清政治史研究，要创新，要有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外洋的号称新理论，一味趋新厌旧，不一定是可取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不可跟风走，不可被所谓“新清史”蒙蔽了学术视野。中国学者，要有自己的学术自信。

三 晚清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

研究晚清政治史，不能不注意到晚清社会性质问题。晚清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晚清社会与清中期、早期最大不同之点，也是晚清社会与数千年中国社会最大不同之点。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主要指此而言。晚清的这个社会性质的变化，影响了晚清历史进程，影响了晚清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影响了晚清政治人物的命运。当事人从社会性质的角度认识这个变化，是懵懵懂懂的。从社会性质的角度认清这个变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通过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很多方面逐渐为外国所操纵、控制，从一个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封建国家，演变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半封建的国家。侵略中国的是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按照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上的看法，由殖民主义国家用战争或其他行为带来一个主权国家或地区国家性质、社会性质全部或局部发生变化的地方，就被称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以中国被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判断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最早提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是列宁。列宁从帝国主义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理论。早在1912年和1919年间，列宁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他是从过渡阶段的社会这样的角度分别提到这两个“半”的，但未作论证。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

决案》，已经开始出现“半殖民地”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和《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等文章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此前后，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李大钊、罗亦农等人均明确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目前所能查考到的最早将两“半”概念联结起来的完整表述。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①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所谓社会性质大论战，就是指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一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研究工作的理论工作者，以新思潮派为代表，与中国托派的动力派和国民党学者新生命派，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斗争，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

1938~1940年，毛泽东连续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他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②“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③这是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最经典的表述。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

① 参见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620、624页。

③ 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0页。

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总之，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①

对这个认识，近些年有人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认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还有人对“两半论”提出了直接的质疑和驳难，认为“两半论”是“失误”，“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② 有记者采访某研究员，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构呢？”某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③ 这里已经把问题提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了。

质疑者说“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质疑者要设计的新的近代史构架是什么，支持这一构架的理论基点找到了没有，始终未见下文。但是，我们对论者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延误了”“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却百思不得其解。前已指出在革命中，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本身所规定的了。所谓“推翻三座大山”，不就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我们倒是要问，如果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能够正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吗？

以上质疑，在研究者中是有影响的。

① 参考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第1~24页。

② 记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这篇报道用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毛泽东‘两半’论的权威面临挑战”。

③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第57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分歧值得注意。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适应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形态，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恰当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为社会形态，它是不可分割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半殖民地是对国家地位而言，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两者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①这个分歧是很大的。分歧的任何一方在据此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时，都可能得出不完全相同的结论。

究竟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可以从学理上去分析，也可以从历史实践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学理的分析，都只能基于历史实践。脱离了历史实践的分析，都是书生之见，是靠不住的。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实践是什么呢？它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分析，才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才能明确革命对象、明确革命力量、明确革命前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是这个历史实践的结果。离开这个历史实践，虚构种种臆测的理论，怎么能与历史的实践相符合呢？历史研究是基于史实的探讨，离开了史实，仅凭思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相联系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社会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正是这种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改变，这就是由一个基本矛盾变成为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当着帝国主义用战争强加于中国、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时候，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就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国内的各阶级可能暂时团结起来，用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当着帝国主义用政治、经济等温和的手段侵略中国的时候，国内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可能与帝国主义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时候，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便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就可能用阶级战争（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封建势力的统治。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① 以上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质疑和讨论，参看倪玉平《近20年“两半”问题研究述评》，《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又见倪玉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研究之新进展》，《北京日报》2009年2月16日。

就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研究晚清政治史，不可不注意晚清社会性质的变化，不可不注意晚清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四 关于晚清政治史几个重大问题的讨论

（一）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开关”问题

20多年前，有文章讨论所谓“开关”问题，认为英国以资本主义文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如果中国不抵抗，中国早已现代化了。这篇文章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王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来得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这种观点还认为：“难道为了‘抗拒’外国，宁肯让我们中华民族退到刀耕火种不成？”它似乎要告诉人们：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落后的封建中国时，中国只能敞开大门让其侵略，绝不能反抗，多出几个林则徐似的民族英雄也无济于事，不过延缓接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时间罢了。^①这样提出问题，不仅涉及怎样看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而且涉及中国人民要不要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这是我所见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提出的近代中国不要抵抗侵略的见解。

这篇鼓吹对外国侵略不要抵抗的文章，显然是把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与侵略混为一谈了，是把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与100多年前清政府被迫引进资本主义文明混为一谈了。今天的开放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采取的主动行动，它同清末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腐败的清政府被迫实行开关不能同日而语。因而在探讨近代史上的“开关”问题时，必须注意区分不同历史时期两种“开关”的不同出发点（或历史前提）和后果，不能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混淆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创造的物质财富比封建主义社会长期积累的财富还要

^① 吕兴光：《应当如何认识近代史上的“开关”》，《北方论丛》1986年第3期。